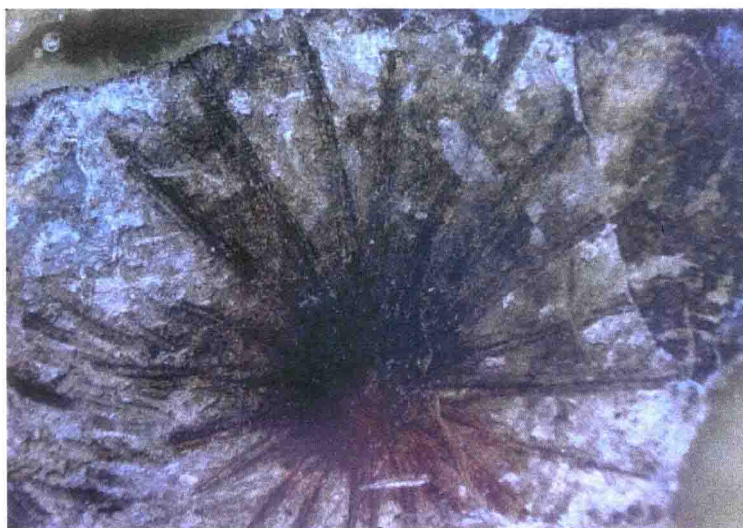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

莲花之源

第一章

人类莲花文明象征：植物之美



山东临朐中国上第三系中新统地层山旺莲化石
(采自于：孙博：《山旺植物化石》，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图版5。)

第一节 人类莲花文明的概念及其意义

1. 关于人类莲花文明研究的意义

第一是人类莲花文明研究的整体意义。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研究中，文明整体发展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又是非常缺乏的。以与人类文明紧密相关的某种物质文化或者精神文化的元素来对人类整体文明发展的整体进行概括、反映和做出判断，是人类文明研究的重要途径和内容。或者说，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研究特别需要采用多样化的途径。人类文明发展体现为某一种具体的文化

元素的发展，而不一定固定为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我们之所以强调“人类”的概念，是因为，我们是在类的意义上看待莲花对于人类的作用的，不是仅仅从某个独特文明的视角来看待的。莲花文明研究就是这样一项原创性的研究。这有利于从不同角度、从整体上来解读人类文明。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讲话指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说明，强调人类整体命运，是历史和时代的选择。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作为“类”的特点十分突出。德国哲学家谢林认为：“中国不是什么中国民族（Volk），而是人类（Menschheit）。”¹顾彬教授认为：“中国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民族主义意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人类。”²美国亚洲协会主席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也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³与这些真知灼见相反，我国国内民族政策却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颇觉怪异。按此，本书所指的人类，既包括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全人类的含义，也指从中国人的观点去看待世界莲花文化的含义。

“荷花在埃及、印度、中国和日本，是古老的多产的象征。象征出生、宇宙生命、脱俗、人类精神成长以及灵魂达到圆满的潜力。”⁴（图1-1-1）莲花对于人类文明生存、发展和美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将莲花图像作为人类文明发展整体元素的研究对象，其根本意义在于说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互动形成的。

“只有文明间的互动才有意义。”“人类这一‘共同体’的历史仿佛是一个此起彼伏的大海，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总有一个或几个快速发展的文明，但它们并不构成‘中心’，而是‘引领者’，人类共同体主要的特征是文明之间的沟通和相互影响。”⁵莲花文明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研究开辟出新的领域和视野。

第二是人类莲花文明研究的大陆文明研究意义。

这里所说的大陆是指欧亚大陆。莲花文明主要是欧亚大陆文明。欧亚大陆总面积达5520万平方千米，占有世界陆地的2/5，囊括世界人口的9/10，孕育了人类最早、最先进的文明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古今众多帝国，⁵有数不清的种族、民族和部落，发生过数不清的战乱、灾害、瘟疫。时至今日，人类最大、最普遍、最频繁的冲突仍然发生在欧亚大陆上。或者说，文明冲突在欧亚大陆仍然以最为激烈的形式反映出来。欧亚大陆古代文明主



图1-1-1 荷花，古埃及的神秘符号，代表地球

（采自于：[英]M.奥康奈尔、L.艾瑞：《象征符号插图百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1 顾彬：《汉学研究新视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

2 梁展：《族群转向与近代中国的国家认同》，《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23日，第13版。

3 [英]M.奥康奈尔、L.艾瑞：《象征符号插图百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4 张向荣：《世界史：只有文明间的互动才有意义》，《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7日，第5版。

5 苏海洋：《论历史地理学人地关系中的尺度问题》，靳润成、宫宝利、毛曦主编《走向世界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7页。

要是埃及、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等民族或国家构成的文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印欧文明到来以前很长时间，确信印度、伊朗和希腊有共同的语言和神话的起源，印度河谷文明也已与美索布达米亚文明有紧密的联系。……有一个地跨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亚欧非文明圈（Zone of Afro-Eurasian），然而基本上都是在北半球，在现代社会到来以前，大多数社会都被发现，他们发展了城市和农业生活，带来了密集的人口。”¹虽然1500年以后的冲突主要是海洋冲突、海域冲突，由此也形成了现代冲突与古代冲突的根本不同。在现代意义上，谁领先了海洋文明，谁就具有了战略优势。但从后现代的意义上说，随着对海洋武器的发展，海洋文明必将收缩，欧亚大陆文明将重新占据优势地位。因此，海洋国家必然要竭力维持海洋文明的领先优势。曾经领先的欧亚大陆文明作用在文化上被低估、降低了。今天，欧亚大陆文明需要重新定义和认识。阿基莱什·皮皮拉玛里认为：“亚洲是一种西方结构。”“我更愿意看到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具有不同区域的大陆板块——欧亚板块，这就不会模糊这些地区拥有大量共同的文化、历史和发展趋势的事实。”“各文化差异明显。”²欧亚大陆各大民族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文化，没有共同的宗教，没有共同的血缘，但是都有和平发展的愿望。他们相互交流只有依靠共同的图像——莲花，从而得到安全的体验、心灵的抚慰和种群的共识。李克强总理2014年10月16日出席在米兰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时表示：“培养和凝聚亚欧共同体意识，积极构建面向和平与发展的亚欧新型全面伙伴关系。”³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开始重视亚欧大陆的作用，正是反映了这一要求。这就需要我们重视以莲花文明为特征的亚欧大陆文明及其相应象征。

第三是人类莲花文明研究的大河文明意义。

我们发现，莲花文明起源发展的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是大河文明国家。古埃及是尼罗河，古巴比伦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河），古印度是恒河，中国是长江、黄河。大陆文明说到底，是大河文明。所谓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区别，根本上是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区别，最彻底地说，是大岛文明与大河文明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是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统一。龙生于田，出于河，游于海，飞于天。大河孕育了各大文明的莲花。在这个意义上说，张大千的画荷巨作《河上华》深刻反映了大河文明的精华。我们研究人类莲花文明，就是研究人类的大河文明，研究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统一。

第四是人类莲花文明研究的植物文明意义。

我们所说的莲花文明，是指以莲花植物的图像及其审美以及莲花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为核心或者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形态。这样的文明形态与动物图像的文明形态或者其他的文明形态共同构成了人类整体的文明形态。一个民族、种族反映自身生活的可以是动物图像，如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广泛存在的动物岩画。然而民族之间的和平交流只能依靠共同

1 参见 Marshall G. S. Hodgson,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Europe, Islam, and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8.

2 《传统亚洲概念不科学》，《参考消息》，2014年9月25日，第10版。

3 《环球时报》，2014年10月17日，第2版。

的植物图像。植物图像不同于以武力冲突为主题的动物图像，后者在古代是以旗帜上的虎豹、熊黑、豺狼等图像为表现对象的。植物图像特别是花朵图像，象征了友谊和平。“人们对生存必需的五谷杂粮少有艺术描述，但对生活可有可无的花草树木极尽赞美，这说明人类在摆脱野蛮的进程中非常注重精神世界的需求。”¹

俄罗斯飞机东北虎头饰（图 1-1-2）。对此有的网友评论说，吓死了。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飞机上绘飞天手持莲花图案（图 1-1-3）。两者装饰主题说明了分别对于动物与植物的偏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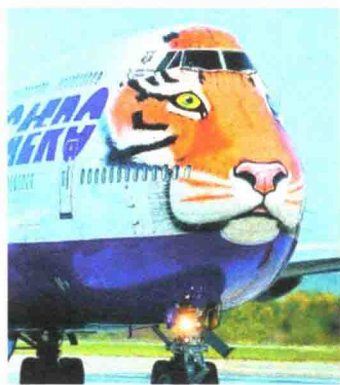


图1-1-2

（采自于：《广州日报》。）



图1-1-3

（2015年8月13日摄于兰州中川机场。）

从物种发生角度来说，植物先于动物。“人类在最初的采集和狩猎时期，对于动物的关注度远高于植物，从原始民族留下的各类神话和器具纹饰以及具有巫术性质的洞穴壁画中可以得到证实。当远古人类从采集和狩猎社会进入到农耕社会以后，人与植物的关系就开始逐渐超越了与动物的关系。”²世界文明中的植物图像主要有莲花、玫瑰和棕榈图像，当然还有百合、菊花等花朵图像，甚至还有“爱尔兰的三叶草花朵、苏格兰的蓟”³。无疑，莲花图像就是植物图像或者花朵图像中最为重要的图像。在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时期，“人类对于植物类食物的依赖逐渐加深，生活形态从游牧转向定居”⁴。当然，莲花文明形态并不反对和排斥其他文明形态，而是与其他文明形态共融、互补，相互激发和相互生成。迄今为止，对于植物文明的研究是非常稀少的，主要是一种现象性的表述。近现代的文明研究者，也少有对于植物文明给予系统专门的理论分析，更缺少独立、专门的著述。近来也有人提出“玫瑰文化”。它是由中国作家符号在作品《玫瑰岛》中提出的一种生活文化概念。所谓“玫瑰文化”，从狭义的思维上来说，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一种美丽的爱

1 马未都：《瓷之纹》（上），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2 刘咏清：《试析楚绣植物图案中的茱萸和莲花纹样》，《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2012年（第27卷），第5期。

3 W. H. Goodyear, *The Grammar of the Lotus*, Printed by Gilbert and Rivington, Ltd, St. John's House, Clerkenwell, Road, EC.1891, p.82.

4 [日]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9页。

情文化：首先，它是一种“爱情文化”，有着对幸福人生执着的追求；其次，它是“美丽的”，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鼓励人们回归生活的本质，在积极的追求中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如果从更为严肃的、广义的角度理解，则可以把它表达为一种特有的追求希望的“生活艺术”，这就可以衍射到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方面。我们认为这个概念立意是好的，但多用于日常生活，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植物图像也反映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花卉纹等植物纹样具有模拟女阴的性质，这是远古人类对女性生殖器进行崇拜的很好见证。”¹也许母系社会更为重视植物纹样。

第五是人类莲花文明研究的花朵抽象意义。

花朵于1.6亿年前在植物界出现。从所有图形中抽象出植物图像，从所有植物图像中抽象出花朵图像，是人类审美认知的重要进展。顺便指出，在中文中，我们使用“花朵”概念而不使用“花卉”概念，是因为“卉”有“草”“枝”的含义，与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完全符合。19世纪后期，新西兰心理学家本杰明·贝茨（Benjamin Betts）尝试用数学方法解决人类意识可视化的问题。他的研究成果充满了惊人的视觉冲击力，所绘制的意识图解几乎都是些花朵图案。贝茨认为这些图表展现了特定活动中的人们的意识轮廓。这些图片收录在1887年出版的《几何心理学，或科学表示法：B. W. 贝茨理论与图解摘要》

（*Geometrical Psychology, or, The Science of Representation, An Abstract of the Theories and Diagrams of B. W. Betts*）一书中，编者系路易莎·库克（Louisa Cook）。在贝茨的形而上学的探索中，他试图用符号数学的形式表现出人类意识演化的连续阶段，并发现依据这种数学表示法常可以得出类植物状的图解。贝茨对此感到满意，认为自己在寻找意识的普遍形态的问题上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另外，他认为，人类的意识是我们唯一可以直接研究的事物，因为其余一切事物必先经由意识方可感知。将极其复杂、难以捉摸的人类意识绘制成具体的形态，这种做法是否合理？恐怕科学家和玄学家会为此争论不休。虽然贝茨的研究方法和图解看起来非常抽象，但这些图解自有其魅力所在。可以想象，一名学习形而上学的学生如何从这些美妙的意识阶段图解中获得深刻的领悟。“图式把握”可以界定为一种特有的知性经验把握方式，不再是以语言作为“元符号”的次级文本。²在当代，人们还把花朵抽象出崇高的意义。人们用花朵迎接喜庆，表达礼仪，悼念亡故。在2015年11月13日，巴黎发生连环恐怖袭击，导致数百人伤亡。一位亚裔父亲在巴黎共和国广场告诉儿子：“他们有枪，我们有花。”³

第六是人类莲花文明研究的图像文明意义。

美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指出：“20世纪50年代当代西方学者开始倡导一种图

1 石中军：《莲花与生殖崇拜》，《世界文化》，1999年，第3～6页。

2 胡易容：《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00页。

3 《新京报》，2015年11月20日。

像的历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形式。艺术作品能产生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意义,而非仅仅是对这些意义的表现。”¹这也说明,历史发展不仅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人类想象力、审美力的发展。甚至可以说,人类想象力、审美力的发展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基本传统和原始动力。

对于莲花文化,125年前,即1891年,美国学者W. H. 古德伊尔(W. H. Goodyear)出版了《莲花规则》(*The Grammar of the Lotus*),对西方文化视野中的莲花现象进行了研究,但是很少涉及印度和中国。艾特·曼(At Mann)和简·莱尔(Jane Lyle)指出:“在埃及、印度和西藏,莲花象征着精神原则从海洋的黑暗中展现,也是女性创造神话的意象。”²杰克·特里锡德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比埃及、印度、中国和日本传统中的莲花具有更古老、更丰富的象征含义。”³他们指出了莲花在埃及、印度和西藏文化中的共性,但是并没有在更为宏观和具体的领域中深入研究。本书试图从世界文明的总体上来把握莲花图像的含义,为莲花文明提供更为清晰完整的世界莲花文化图像。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莲花图像形成了典型的审美完型模式。人们在形成了莲花图形的审美模式之后,便在处处时时希望重新获得这样的莲花的图形,以完成自己的心理和认识需要。“在结构空间里,‘审美完型’的冲动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造弥漫于整个画面,一次次将有意味的形式传达给视觉主体。”⁴民族的、集体的同类审美需要便形成了民族、种族或者人类共同的审美需求,形成了共通文化心象。这是图像化的基本目标。⁵

2. 关于人类莲花文明研究的符号内涵

象征问题特别是符号问题涉及较为复杂的领域。本书试图从历史上的莲花图像出发,而不是从理论逻辑推导分析出发提出莲花文明的符号内涵,借以反映符号与现实和历史间的互动关系。

第一是关于莲花图像起源的研究,因此称为莲花之源。从符号内涵上看,莲花图像的起源反映了符号自觉。⁵

第二是关于莲花宗教信仰文化的研究,体现了人类的神圣情感和精神发展,因此称之为莲花之情。

第三是关于莲花装饰人体的研究,体现了人身审美能力和方式的发展,因此称之为莲花之身。这里,出现了象征符号与人体的结合,成为了一种典型的人体符号或人化符号。

第四是关于莲花图像装饰形式的研究,因此称为莲花之形。这里典型体现了莲花抽象符号。这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被抽象为纹饰的花朵象征符号。并且,莲花抽象纹饰还出现

1 万明:《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52页。

2 At Mann, Jane Lyle, *Sacred Sexuality*, the Brigewater Book Company, 1995, p.54.

3 [英]杰克·特里锡德:《象征之旅》,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4 [英]克莱夫·贝尔:《艺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5 胡易容:《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了多种形态。

第五是关于莲花文明发展和交流的研究，包括莲花文明在不同国家发展的途径和特点。因此称之为莲花之路。它类似于丝绸之路、玛瑙之路、玉石之路、瓷器之路、草原之路、沙漠之路、皮毛之路、珠宝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等等。¹从符号内涵上看，莲花图像的起源反映了符号自觉，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等世界文明古国的莲花图像起源来看，它们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莲花的“符号自觉”，并由此开始经历了“符号化对象→感知符象→集体心象→媒介化景象”²的过程。这从本书全书中可以看出，这些路实际上也是莲花之路。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国家民族中，这些道路可能有不同的名称和内涵。这不仅体现了莲花象征符号的起源，还特别体现了莲花符号的传播。在传播中，莲花符号不仅促进了文化的同质化，使不同文化得到整合，还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异类化、异型化。例如在古希腊、罗马、欧洲文化传统中，莲花符号被“百合化”或“忍冬化”；在亚洲文化某些地域或内容中，被“柿蒂化”。

第六是关于莲花文明发展目的宗旨的研究，因此称为莲花之魂。这里，我们要对莲花起源和传播中的异类、异形物质进行反拨，强调莲花符号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共同点。同时强调莲花与其他花卉象征符号的结合及其产生的新的含义。

3. 关于人类莲花文明研究的方法

一是莲花文明的整体研究、结构研究。

所谓整体研究是指通过对莲花图像作为人类文明发展整体元素的研究，促使莲花文明研究形成科学的体系，成为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从而揭示莲花文明研究的规律，开辟莲花文明研究的新领域，使莲花文明研究的全貌得到多角度、多层次的体现和反映。

所谓结构研究是指对于莲花文明的因素采取结构分析的方法，运用结构的、共时的和历时的方法等，来探索开启研究莲花文明的发展样式、文本框架和认知框架。特别是采用将展现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的文明的材料相互证明的方法，使莲花文明内涵得以丰富地展开。

二是莲花文明的艺术图像研究。

古德伊尔指出：“在人类早期时代，首先完善了装饰图案的文明，其发展程度相较于其他文明而言要更高，而这种文明能够对其他文明产生非常强烈的影响，首先是通过文明，然后通过伴随文明产生的装饰形式和风格。这是装饰史发展的事实，字母和文字的发展史也惊人地类似，而字母和文字史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装饰史的这种现象。”³常宁生、顾华明指出：“人类的文化从视觉认知和感受的角度，可以分为文本文化和图像文化

1 《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0日。

2 胡易容：《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3 W. H. Goodyear, *The Grammar of the Lotus*, Printed by Gilbert and Rivington, Ltd, St. John's House, Clerkenwell, Road, EC.1891, p.374.

两大类。文本是人类发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更系统准确地传达和沟通的需要而创造的一种符号系统,图像则是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模仿和想象所创造的另一种表现与传达的方式。在人类还未出现之前的史前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制作图像。”¹本书对于莲花文明的研究主要是图像研究,建立在文本文化和图像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这也是由莲花本身特点所决定的,因为莲花在直接感知的层面上首先是以图像的状态存在的。对莲花图像进行研究,包括对莲花图像的起源、流变、发展及其历史事件等的研究;对莲花图像的形状、艺术特点、风格等的研究;对莲花图像意义的研究;对莲花图像含义、象征、宗教作用等的研究。在研究中也对有关莲花的文献概念进行了分析,但仍是以莲花图像为主的,文字叙述也是以充分地阐释莲花图像为目的。

三是莲花文明的比较研究。

所谓莲花文明的比较研究,不仅是莲花文明与其他植物文明进行比较,而且还要与动物文明进行比较,进行了对比研究、比较研究后,从中找出共同的规律、系统的关联和体系的构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是提倡动物文明的,他们的国旗和国徽上常有动物形象,最常见的是鹰。中国清代有黄龙旗,龙虽然是虚拟的,但也是动物形象。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国旗改成了几何形态符号。这些几何形态符号从根本上来说,是星象或者花朵的象征。当然这些比较是在适应文本需要的情形下进行的。

四是莲花文明研究的博物学和田野调查方法。

莲花文明研究的博物学的考察方法是莲花文明研究的重要方法,体现在对各国各地区莲花现象的实地观测中。为此,笔者访问过美国(1991、2013)、俄罗斯(1995、2001)、澳大利亚(1997)、意大利(2000)、梵蒂冈(2000)、圣玛利诺(2000)、荷兰(2000)、巴西(2001)、波兰(2001)、日本(2002)、韩国(2002、2012)、中国香港(2002、2007、2012)、中国澳门(2002、2012)、英国(2003、2008)、马来西亚(2003)、越南(2004)、柬埔寨(2004)、德国(2005)、奥地利(2005)、比利时(2005)、丹麦(2005)、中国台湾(2006)、加拿大(2006)、古巴(2006)、墨西哥(2006)、瑞士(2008、2012)、法国(2009、2012)、西班牙(2010)、希腊(2010)、以色列(2010)、土耳其(2011)、芬兰(2011)、匈牙利(2011)、南非(2011)、摩洛哥(2012)、瑞典(2012)、老挝(2014)、斯里兰卡(2014)、约旦(2014)、伊朗(2016)、巴基斯坦(2016)、乌兹别克斯坦(2016),加上埃及和印度,共44个国家和地区,参观了诸多的学校、博物馆和文化遗址。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参观了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亚洲国家馆和突尼斯等非洲国家馆。

笔者在对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文化特色、文物古迹了解观察的同时,还参观了许多博物馆。其中主要专业博物馆有埃及国家博物馆、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

1 常宁生、顾华明:《总序》,[波兰]安妮·麦克拉纳:《取消图像——反偶像崇拜个案研究》,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斯博物馆、印度国家博物馆、瑞士江诗丹顿钟表博物馆、土耳其埃尔祖鲁姆博物馆、土耳其国家博物馆、托普卡普皇宫博物馆、芬兰国家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南非人种博物馆、希腊国家博物馆、希腊埃皮道洛斯遗址博物馆、约旦博物馆、约旦考古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山东临朐县博物馆、河南南阳汉画像石博物馆、中华世纪坛展览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四川鹿野苑博物馆、四川汉代画像砖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宁夏贺兰山岩画博物馆、吉林集安高句丽文化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河北邯郸博物馆、西安博物馆、嘉兴博物馆、吉林省查干湖渔猎博物馆、赤峰博物馆、烟台博物馆、登州博物馆、甘肃秦安大地湾博物馆，等等。另外，还参观了许多图书馆、展览馆、科技馆等。这些访问，实际上是采用的博物学的方法。所谓博物学，是我们身边的学问，是广博宽泛地理解万物的学问，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随地地感受和运用的智慧。¹古代中国人有博物的传统，今天的全民收藏热也体现了博物的爱好，但却没有世界性的、世界文明的博物视野。莲花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莲花文物博物的机会和途径，值得今后不断努力。我还在多国多地的许多文物古迹点、田间地头进行了调查，获取了许多资料，拍摄了许多照片，这些收获尽量都体现在本书中。

通过这些参观调查访问，笔者进一步发现，莲花图像广泛流布亚洲、非洲、美洲，甚至欧洲地区，成为佛教、印度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共同喜爱的图像。世界历史上没有一种花卉可以受到这样广泛的尊崇。只有莲花图像凝聚起了不同文明间的共同因素，构成了花卉特有的、最为广泛的人类莲花文明。

总之，本书试图通过运用新的文明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从浩若烟海的莲花文明的材料分析中提炼出一般的、抽象的概念，以期对莲花文明发展演化规律进行更为概括、更为普遍的解释，由此对莲花文明形成现代科学的、学科的认识和总结。

4. 关于莲花图像的识别方法

（1）识读法

我们在许多文献和图像中发现了莲花图像。莲花图形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莲花主题曾被误认为‘贻贝’、‘曲棍’、‘花蕾和花’图案、‘金银花’、一个‘卵锚饰’模型、一片‘常春藤叶子’、‘鸢尾花’、‘串叶松香草’、‘松果’、‘叙利亚花朵’和‘腓尼基的花束’。”²“至今未提及的一种亚述的装饰类植物，就是所谓的‘石榴’（与

1 刘啸霆：《以博物方式繁荣中华古典学》，《光明日报》，2014年2月19日。

2 W. H. Goodyear, *The Grammar of the Lotus*, Printed by Gilbert and Rivington, Ltd, St. John's House, Clerkenwell, Road, EC.1891, p.49.

棕饰叶相关)。这些描述亚述装饰物的插图是经常在呈现了种子生球茎莲花的印度纪念碑上被发现的一种形式的夸张表现。”¹“莲花符号的重要性是它在展现历史进程时表现出的包容性上,也就是它对历史上各种崇拜本质的体现。正是莲花,将罗得岛和塞浦路斯的神话与希腊及叙利亚的神话连接到了一起。”²对此,需要正确地对莲花图像进行释读。古德伊尔在很宽泛的范围内释读识别了莲花图案。

(2) 抽象法

古德伊尔指出:“在大英博物馆中展示的来自尼尼微的埃及-腓尼基人的象牙牌匾正是用莲花来解释了……三角图形。”³古德伊尔书中采用了许多插图,但都是摹拟画,不是照片,从而使其学术价值受到影响。这受当时历史局限,不能苛求。

(3) 观察法

观察识别是莲花图像释读的一个主要的方法。古德伊尔指出:“他们中的七个图案能够直观地识别为普通的莲花样式。”“大量的波斯石柱基底都是由自然的莲花样式而来,这些或许可以从卢浮宫的馆藏或是出版物中的插图中观察出来。”⁴

(4) 类比法

许多莲花图像的释读凭单体是很难认识的。我们把很多的莲花图形联系起来,寻找其共同的规律。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关于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张弓指出:“(1)运用专题形象序列内多帧图像,对照排比研究,是为自证。(2)运用历史文献记载,同历史图像比较对照,互为证实,互为证伪,互为补充。(3)不同形象序列之间,相关图像对应互证,互相发明。采集外域图像,同本土同类图像比较互证。中外对照,视其异同,查其渊源演变,借以揭示两者间的历史文化因缘,及本土形象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神话对本土形象内涵的参悟认知。”⁵这一方法对于莲花图像的识别是非常有用的。

(5) 排除法

古德伊尔指出:“有趣的是莲花无常易变。在此情况下,我们也知道它是莲花,因为不可能是别的花。古代具有象征意义的花饰只有一种,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该花易变无常,有多种难以识别的分解形式。只要仍只有一种植物可以代表意义,那么它和自然生长

1 W. H. Goodyear, *The Grammar of the Lotus*, Printed by Gilbert and Rivington, Ltd, St. John's House, Clerkenwell, Road, EC.1891, p.181.

2 W. H. Goodyear, *The Grammar of the Lotus*, Printed by Gilbert and Rivington, Ltd, St. John's House, Clerkenwell, Road, EC.1891, p.240.

3 W. H. Goodyear, *The Grammar of the Lotus*, Printed by Gilbert and Rivington, Ltd, St. John's House, Clerkenwell, Road, EC.1891, p.135.

4 W. H. Goodyear, *The Grammar of the Lotus*, Printed by Gilbert and Rivington, Ltd, St. John's House, Clerkenwell, Road, EC.1891, p.191.

5 张弓:《从历史图像学到形象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编:《形象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的外形是否相同就没有任何区别了。”¹

古德伊尔指出：“棕叶饰点缀着莲花和莲花花蕾的这种经常性联系已经被提到。直到我们认识到‘忍冬饰’其实是莲花，我们才能辨别这些花苞其实也是莲花的花苞。这些图片就说明了当时莲花花苞装饰与莲花和棕叶饰的搭配非常流行。”²按照古德伊尔的说法，我们在莲花研究中极其容易排除其他的花朵象征。这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

5. 关于本书写作具体问题的说明

第一，关于本书的内容表述。

本书内容采用了文字说明、图像说明和引注说明的方法，简称为文、图、注的方法。有的学者采用了名称、传略和图像的排列方式，³或称为名、典、图，类似于道家的意、象、言关系，类似于佛教的名、实、相方法。我们希望通过新的文、图、注的方法，能够做到古今融会、中外贯通、图文并茂。图像说明也指用图像说明图像，引注分为文中注、图下注和页下注。同时也是为了节省本书篇幅。

第二，关于莲花图像的概念。

本书在不同的地方采用了不同的概念，例如莲花象征、莲花图像、莲花形象、莲花意象等，主要是为了强调同一概念的不同侧面，有时也为了引用和行文的方便。书中相关内容及副标题使用了“象征符号”的概念。

第三，关于本书的结构。

本书在研究和写作中采取了分主题、分区域、分国别表述的结构。在这一结构方法下，采取以历史为经，主体为纬，也就是时段与主题相结合的方法。长时段历史中有主题，主题中有长时段历史。在一个时代强调一个时代有关莲花的主题，并与其他时代、文明类型比较，以充分展开讨论。

第四，关于本书的层次。

按照卡西尔三个存在层次，即物理存在之层次、对象表现之层次、人格表现之层次，来概括人文对象特质的理论，本书对莲花图像，分为物理意义上的，主要指植物学意义上的；对象表现上的，主要指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意义上的；人格表达上的，主要是体现在中华民族莲花图像上。中华民族莲花图像的人格含义，与卡西尔对于人文对象的表达层次的理论要求吻合。这是人文艺术理论与实践互证的一个范例。

1 W. H. Goodyear, *The Grammar of the Lotus*, Printed by Gilbert and Rivington, Ld, St. John's House, Clerkenwell, Road, EC.1891, p.218.

2 W. H. Goodyear, *The Grammar of the Lotus*, Printed by Gilbert and Rivington, Ld, St. John's House, Clerkenwell, Road, EC.1891, p.180.

3 啸声编：《基督教神圣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五，关于本书引用的图例。

本书在引用图例时，有的图片效果不好，但是为了说明问题，只好引用，因为一时没有更好的图例。许多图像由于采集的难度，在摄影上和制作上的效果不一定令人非常满意，但好在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问题，强调它的真实性，而非仅仅作作为艺术来欣赏。援引莲花图例往往是为了示意性的说明，不说明对于某种莲花图像的特别的艺术的或者非艺术的强调或者偏爱。也就是说，有些莲花图像、图例是可以替换的，不具有唯一性或者排他性。有的同一主题的图例，引用稍多，也是为了能够较为充分说明情况，同时也是因为很难取舍。对于引用的图例，笔者并不认为没有可以从多种角度提出的瑕疵，这是由于引用的目的是为了对于相关主旨进行力所能及的说明，当然，对这些瑕疵的负面作用，笔者尽量予以避免。

第六，关于本书引用的文字材料。

引用的其他学者的著作或者成果，都尽量予以标明。属于常识的没有标注。

第七，关于本书主题分析的边界。

本书采用“纪事本末”方法，做通常为满足说明基本问题所需要的分析，也就是争取一次分析一个主题。按照一个主题发散阐释，打破了国别、历史划分的界限，直到把这个问题分析完。我们无法对每一种文明形态关联问题做穷尽式的探究，也尽量不介入对于文明形态的争论和分析，只是从分析莲花图像的角度对于不同的文明形态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八，关于本书使用的语言材料。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主要引用的是汉语材料，也有一些外文材料。这里的问题是，汉语的翻译是否能够充分反映外文文献本意，这也是衡量中西文化交流是否足够的一个方面。目前汉语的翻译基本上反映了外文文献成果。“西方的每一部著作，无论对中国持批评的态度，还是保守的意见，都会在原著出版没有多久就被译成中文。”¹然而，笔者缺乏征引印度、埃及、波斯等语言文献的能力，尽管这一缺憾可以使用图案得以部分弥补。

第九，关于本书使用材料的翻译名称。

本书使用材料的翻译名称参考了中国人习惯的翻译方法。在说明作者作品时把国别放到作者的前面。关于有关材料的时代，本书也注意予以标明。

1 胡易容：《图像符号学：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页。

第二节 人类莲花文明研究涉及的学科

1. 人类莲花文明研究是多学科或者跨学科的研究

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及学科目标。不同的学科在研究丰富的莲花文明现象时产生了不同的视角和内容。本书对于莲花文明的研究内容需要通过多学科的方法的运用显现出来。由于对象的特殊性,涉及的学科包括植物学、美术学、考古学、符号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文学、服饰学等,而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专门的考证或者研究。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指出:“要进行跨学科研究,挑选一个‘学科’(一个主题)而后扩展到它周围的两三门学科是不够的。跨学科的研究旨在创建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研究的新对象。”¹莲花文明在研究中,应当创立一门独立的学科——莲花学。

2. 人类莲花文明研究是人类历史的研究

第一,人类莲花文明研究是人类历史的宏观研究。

近期,有关人类文明的宏观研究受到了重视,这就是历史的大尺度研究。本书把莲花图像的出现和发展作为一种历史的大尺度研究。特别注重莲花象征图像的跨文明、跨时代研究。通过莲花图像的研究,体现和反映人类文明形态的源流发展;通过莲花图像的解剖和分析,从中找出演化的规律和线索,反映出人类莲花文明的全景式研究。这种全景式研究“假设在某一限定的时空层的全部事件之间,在人们创新发现其印迹的各种现象之间人们能够建立某种同质的关系系统:因果关系网络,——它可以将这些现象中的任何一种现象派生出来,类比关联,——它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如何互为象征的,或者它们是如何一致地表现出同一中心核的”²。

1 转引自常宁生、顾华明:《总序》,[波兰]安妮·麦克拉纳:《取消图像——反偶像崇拜个案研究》,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2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页。

第二，人类莲花文明研究是人类历史的多元研究。

这里，需要纠正传统的欧洲中心历史发展线索。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G. S. Hodgson）指出了长期流行在世界历史中的成见：“我们知道传统的故事进路：历史开始于东方，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埃及（然而不是天堂，还有更远的东方，如同中世纪西方人所说）；火炬顺利经过希腊和罗马，最后到达西北欧洲的基督教徒手中，发展了中世纪和现代生活。印度、中国、日本也有古典文明，但是对于主流历史来说，他们是独立于主流的，贡献也小。”¹这样的世界史观的问题非常多。但是最为核心的问题是西欧文明继承了世界历史文明发展的主流，而伊斯兰、印度和中国成了非主流的文明。莲花文明研究正好说明，莲花象征自美索布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影响了希腊、罗马等，正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世界历史发展道路。有学者指出：“在印欧文明到来以前很长时间，确信印度、伊朗和希腊有共同的语言和神话的起源，印度河谷文明也已与美索布达米亚文明有紧密的联系。”²欧洲文明并不是最先发展起来的，此前的亚非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且形成了特色文化圈。这样的视角为亚非欧大陆文明的研究，为人类基础文明和世界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线索。

第三，人类莲花文明研究是人类历史的连续研究和不连续研究。

人们长期的理论习惯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按照一个步骤接一个步骤、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依次线性发展的。这种历史发展观的问题是，让历史的发展服从人对于历史的发展的认识和理论。莲花文明研究基本符合这个认识规律。而且，越是深入研究人类历史就越是发现莲花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完整性和系统性。但是，还必须看到，历史的发展往往突破人们的思维和理论，具有特殊的不连续性、突然性和跳跃性。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指出：“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已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性就随之越来越大。”³例如殷墟车马坑仿佛横空出世，而更早的更为简单的模型再也没发现。⁴这些分析对于莲花文明的研究是适用的。莲花图像往往由于同时具有审美的非利益性、非日常性、非经验性而容易产生断裂性、不连续性、突然性和跳跃性。有的文

1 Marshall G. S. Hodgson,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Europe, Islam, and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

2 Marshall G. S. Hodgson,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Europe, Islam, and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0.

3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页。

4 杨雪：《骑马乘车闯世界》，《光明日报》，2014年2月17日，第12版。

明文化中莲花图像的出现往往是显得突然的、碎片化的、断裂的。某些莲花图像或者构想只有在特殊的历史形态下才会突发出来。因此,用线性的、常规的、生存性的方法不一定适合莲花图像研究。莲花图像研究在世界历史短时期来看,呈现出不连续性;从长时期来看,可以从这些不连续性中找到连续性。

第四,人类莲花文明研究是人类历史的特殊序列研究。

在历史研究中,要注意研究对象的特别内容、特别性质和相互之间的特别通道。米歇尔·福柯指出:“今后,问题的所在是建立序列:确定每一序列各自的成分,规定它的界限,揭示它特有的关系类型,找出它的规律,并且更多的是描写不同序列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莲花图像虽然在相互影响下有着相同点,但是还有着独特的序列和特殊的内容,不能完全用相同的模式去套取。目前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研究往往产生相同的结构,是产生研究工作的公式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的工作找出这些特殊序列和特殊内容。每一个文明类型的莲花图像都是不同的,不需要用一个文明形态的莲花图像方式去套用另一个文明形态的莲花图像方式。

3. 人类莲花文明的研究是艺术图像学的研究

本书重视文献的说明,同样重视图像的解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W. J. T. 米切尔指出:“当前学术界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转型。这一转变被称为‘图像的转向’,由此艺术史学科将会从理论的边缘性转化到学术中心的位置。今天,艺术图像和视觉文化研究正逐渐成为学术和文化研究的中心。”¹中国古代原有以图证史、左图右史的传统。所谓“左图右史”,实际上是认图写史,左手指图,右手写史。南宋史学家郑樵在其著作《通志》中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者,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²使用艺术图像学(art iconography)研究莲花文明是一个合适的主题。克莱因鲍尔(W. E. Kleinbauer)提出:“对视觉艺术的历史探究即图像学。”³李静杰指出:“图像学的使命,就是在解析图像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潜藏的各种信息,最大限度地揭示当时人的想法。”⁴莲花研究使用艺术图像学及其展开学科,诸如

1 转引自常宁生、顾华明:《总序》,[波兰]安妮·麦克拉纳:《取消图像——反偶像崇拜个案研究》,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2 陈仲丹:《对图像史学的界定和思考》,《光明日报》,2014年4月23日,第16版。

3 转引自[美]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7页。

4 李静杰:《图像与思想——论北朝及隋的佛教美术》,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清华讲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8页。

比较文明图形学、史前艺术图像学等，根本上还是用以发现“当时人的想法”。按照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说法，象征符号是一种与其对象没有相似性或直接联系的符号，所以它可以完全自由地表征对象。范曾提出：“汤因比、斯宾格勒、雷海宗可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他们一涉及艺术史，便有三缄其口的窘态，因为他们不是艺术的鉴赏家，或者他们缺少了一些什么。”¹史前艺术图像学（prehistory-iconography）把莲花作为主题，是因为在众多的史前和早期的考古材料中，莲花作为文明因素和考古内容，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在过去的考古学的发展中，莲花研究没有获得相应的重视。通过莲花的研究，我们可以为史前艺术图像学提供丰富的材料，从而可以指导在考古中获得新的发现。按照艺术图像学的要求，本书采用以图像来说明莲花文明的源流和发展，以图像作为研究对象和基本材料的方式。莲花图像这个概念的使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艺术图像学的概念上使用的。

最近，我国学者提出了“图像史学”“形象史学”的概念。张弓指出：“‘形象史学’的旨趣在于，将特定的文物图像（含实物）序列当作学术主体，围绕它展开相关的研究活动，力求探赜表微，解读这个序列形象中先天包蕴的历史文化意蕴。这一崭新的学术主体与学术视角，与其说出自学者群体首倡，不如说出自数十年文物考古学、物质文化史的繁荣，试图揭橥新生面。”²从“形象史学”的角度来说明莲花象征的历史，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人类象征的发展史。

4. 人类莲花文明的研究是象征符号学的研究

符号学的核心是象征研究。当前象征研究在人文研究上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德国学者卡西尔提出：“人是象征的动物。”英国学者科恩认为：“从根本上说，人是运用象征的动物。”象征对于人类组织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号召力。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象征的作用。《诗经·小雅·角弓》指出：“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借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事物暗示特定的人物或事理，以表达真挚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这种以物叙事的艺术表现手法叫象征。象征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中，意为“一剖为二，各执一半的木制信物”，但随着词义的不断衍生，如今的“象征”的意义渐渐演变为以一种形式代表一种抽象事物。象征人类学认为：其一，象征是文化的。象征是文化和意义的体系，或者说，文化是通过象征形式来表现意义的模式。主张把象征及其意义作为文化的核心进行研究，寻求象征的多义性和多层次的理解。象征是文化的建构，大多不具有普遍公认的意义，同一种事

1 范曾：《画凌烟阁——欣读十二珍品阁》，《光明日报》，2014年2月21日，第8版。

2 张弓：《从历史图像学到形象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编：《形象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